

白赶快向外突围。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，躺在担架上。瞿秋白说：“我病到这个样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你快点走吧！”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，他就是不走。我拉他走，他还是不走。他说“你快点走吧，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。”（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），无奈，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……边打边走……向闽西走去……^①。

瞿秋白被捕后，说中共中央下令劫狱不成，“就把他弄死”的谎言，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人员陈不旧的《瞿秋白与中国共产党》一书。造谣诽谤是国民党特务的本能，而传布流言则是一切反共文人的惯用手法。他们共同信奉的是戈培尔的“造谣千次，就成为真理”的哲学。但谎言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，只能暴露制造流言者的可耻面目。

司马璐还说瞿秋白“临刑时”“绝不是共产党所宣传的，高呼‘打倒’‘拥护’之类的口号”。瞿秋白从容就义，决不是共产党所“宣传出来”的，而是客观事实。据天津《大公报》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第四版登载的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导：瞿秋白来到公园，“信步至亭前，已见菲菜四碟，美酒一甕，彼此独坐其上，自斟自饮，谈笑自若，神色无异。”餐毕，瞿秋白手挟香烟，顾盼自如，缓缓而行，沿途唱《国际歌》，《红军歌》，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！“中国革命胜利万岁”！“共产主义万岁”！临场监刑的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光晷原是留俄学生，他当时清楚地听到瞿秋白用俄语唱“英特纳雄奈尔……英特纳雄奈尔”的歌声。瞿秋白到达刑场后，英勇就义，年仅三十六岁。对瞿秋白的这种浩然正气，一切断了脊梁骨的反共政客，当然是无法理解的。

司马璐在历史上一度被国民党“制造过”，“他懂得‘制造’在政治上的重要”，所以他开了一个“制造”工厂，炮制出诸如《瞿秋白传》等反共作品来毒害青年。五十二年前，国民党特务赵庸夫利用瞿秋白的牺牲，编造谎言，要“一般执迷不悟的共产青年”“悔前恐后”。半个世纪后的今日，司马璐继承赵庸夫的衣钵，“制造”出一个假瞿秋白的形象，企图蒙骗革命青年。但历史证明赵庸夫的险恶用心挽救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“花落”时代，而司马璐的行为同样不能使国民党的“春残”回光，广大革命青年矢志不渝地沿着瞿秋白所开辟的“光明之路”奋勇前进，为实现“共产主义之人间化”而奋斗不息。革命青年将永远怀念他，秋白如九泉有知，一定会瞑目含笑的！

一九八七年二月

^① 见陈铁健：《最后的斗争》。

一点质疑

我国外国文学教材，如《欧洲文学史》、《外国文学简编》在论及莎士比亚创作时，一般都认为莎翁创作初期（1600年以前）正值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极盛时期，而中期（1600年以后）则是女王统治开始岌岌可危，社会矛盾尖锐，英国国力衰退之际，以此来划分莎翁戏剧创作的时期，并作为说明和界定莎翁早期之所以创作喜剧、历史剧，而中期之所以转向悲剧创作的唯一依据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如果我们查阅一下英国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历史，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我们自己主观上制定出来的想当然的模式框框，而事实则不然。英国史上伊丽莎白时代是一个整体时代，不存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。整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，国力一直强盛不衰，社会基本安定繁荣，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。尤其是她在位后期，不仅处死了代表天主教贵族利益而试图争夺王位的苏格兰女王玛丽·斯图亚特，击溃了西班牙的“无敌舰队”，而且在1600年成立了掠夺殖民地的“东印度公司”，增强了国力发展的经济基础，深得资产阶级拥护。其执政末年，内外政策更加开明，反专制独裁倾向日甚，这都有利于以人文主义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。英国史上从未把1600年作为划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前后两个时期的界线，不知以此来划分莎士比亚的创作时期，是否妥当？

（敏捷）